



## 讲述中华民族文化与潮汕文化融合的中国故事

——读厚圃长篇小说《拖神》

□廖令鹏

作家厚圃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拖神》，以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为主要历史背景，跨度长达60年。主人公陈鹤寿被命运推到潮汕平原一个叫樟树埠的人海港口，凭借其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潮汕人的精干和过人的胆识，在荒芜贫瘠、族群混杂的土地上筚路蓝缕、开疆拓土，带领樟树埠父老乡亲“造大船”“建船行”，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下南洋，向海而生、向海而兴，推动樟树埠的兴旺和崛起，逐渐融入世界。

处于中华民族动荡纷乱的大变局中，陈鹤寿从一个偏僻山村的秀才逐步成为樟树埠的精神领袖，享誉潮汕平原的商贸大亨，走向海上丝绸之路的民族义士，他的身上呈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英雄主义色彩，彰显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核心力量。他的命运和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潮汕文化相互融合的精彩绽放，是中华民族沧桑正道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印证。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也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拖神》虽然写的是180多年前的历史故事，但仍然带给我们深刻的现代启示。潮汕人以自强不息、团结奋斗和创新冒险的精神，一次又一次战胜自然灾害，抵御外敌入侵，重建战乱荒芜的家园；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片热土又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们的生活不断改善，家族繁衍昌盛，精神文化力量历久弥坚，“潮商”也成为全球商贸的中流砥柱。如今“樟树埠”和“红头船”仍屹立于广阔的南海之滨，眺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拥抱世界的精神源泉之一。所以说，《拖神》不仅是潮汕叙事“小说史话”，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潮汕表达”。

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潮汕文化的特质以及它在中国历史坐标系中的方位，为《拖神》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故事背景和叙事资源。厚圃是潮汕人，有着潮汕文化的深厚积淀，十多年前就写过两部潮汕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及众多中短篇小说，后来继续深挖潮汕的历史文化，十年磨一剑，写出《拖神》这部厚重之作。小说可圈可点的地方有很多，尤其是在围绕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世界变局与地域兴衰、潮汕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方面，给出了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潮汕故事。我将其归纳为“三个”。

“一个人”。《拖神》成功塑造了陈鹤寿这个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晚清秀才，受儒家文化熏染，待人处世讲究“仁智礼义信”，年轻时就有杀身成仁的英雄情怀。后来多次遭遇历史动乱，都是为众人抱薪，守护家园，大义凛然。他又有着潮汕人的精明和变通，敢为天下先，敢于冒险。他在逃亡途中拐走“表妹”，贩卖“鬼火灯笼”，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使置

舒婷、顾城、海子、汪国真、余光中、席慕容……稍微了解中国诗歌的“60后”“70后”，都能脱口而出这几位诗人的名字。他们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也把现代诗歌带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高度。然而，跨入新世纪，我们发现当今的中国诗坛似乎不如过去那么辉煌，多少有点沉寂的意味。在这种环境下，马舜偷偷写了很多诗，由最初的“羞于让人知道”，到现在出版诗集《黑塞上空的呼吸》，给当今诗坛带来了一丝清新的气息和生机的律动。

“读黑塞，就像在和自己在对话。”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定生活积淀和善于思索的人都会爱上黑塞，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见到两个“自我”，一个是向往纯粹思想和归隐的个人生活，有一定的情感疏离特质和道德洁癖的荒野人，另一个则是具备强烈的人世热情、长久的尘世流浪、复杂的情感关系和遭遇精神危机的闹市人。这两个“自我”时而分离、相互对抗，时而合一，互相拯救、共同搀扶，一起迈向更具完整的“新我”。灵魂漂泊，这是诗人的命运，也是现代人的宿命。

马舜来自豫南大别山区的小山村，“家乡的小径、乡村的夜晚、屋前屋后的小草与树木、天空的星星与白云”，还有慈爱的妈妈，都曾是他眼里的世界。面对喧嚣繁杂、钢筋水泥、人情冷漠的城市环

境，他无处可遁，“一人躺在田埂上，家里的那头老水牛在前头啃着那永远啃不尽的青草，看着天空上的朵朵白云，想着它们飘去的方向”的儿时时光只能成为追忆。随着岁序渐长，他在城市生活的浮沉里一路追寻，追逐自己心中的那一束幻光，但感受到的只是灵魂的漂泊，“沉入了无边的苦海”。乡村与都市、静谧与喧嚣、理想与现实、真情与虚伪、繁忙与孤寂，回不去的故乡，甩不掉的城市烦恼，种种矛盾和纠结，对“那种自由与无束、追求与向往、任性与流浪”的生活的渴望，让他有了“像写日记一样地写诗”的冲动，在心里觅一处宁静的港湾，让漂泊的灵魂沐浴在充满泥土芬芳的乡野里，“诗也就像日子一样被慢慢地攒了起来”，于是便有了这部诗集。

“一尊神”。在人类发展史上，“神”曾经是人类灵魂的主宰，“魂魄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拖神》在书写陈鹤寿传奇人生的同时，塑造了一尊潮汕地区民间特色鲜明的神仙“水流神”，这是陈鹤寿依据自己内心的需求在樟树埠“创造”的神。《拖神》从“神”开篇，以“神”收尾，不断穿插着人与神、神与神之间的对话和关系的变化，借神写人，创造了一个人们可以与之进行灵魂和心灵对话的“他者”，又因人写神，创造了一个超越世俗生活与人类苦难现实的“他者”的世界。《拖神》中，人可以创造神，也可以推倒神；可以敬神，也可以“拖”神；神能庇佑人，也会控诉人（“拖神”后来也成为潮汕绚丽奇幻的文化风俗活动）。神也有他们的生存世界，各路神明借由他们庇佑的子民在属于他们的秩序中明争暗斗，颠簸沉浮。这种文化景观在中国文化当中实属罕见。厚圃将人与神的互动关系写得跌宕起伏，荡气回肠，这种苦心孤诣，归根到底就是要以陈鹤寿为代表的潮汕人、潮汕商人的精神谱系做文学上的考据，从信仰和图腾当中探索他们精神文化的源流，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等颇具现代性的哲学命题。一部大作必有相当的精神品格来支撑，《拖神》从“神”这一超越世俗世界的视角来探索潮汕人的精神脉络和灵魂家园，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一条船”。广东潮州出海的商船，“船头油以红色”，被称为“红头船”。潮汕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商业意识较强，他们驾驶红头船扬帆“下南洋”，奋力“闯世界”，形成以冒险拼搏、同舟共济、诚实守信为主要内涵的“红头船精神”。《拖神》描绘的樟树埠，原型就是广东汕头“樟林港”，清朝时这里“千帆林立，百舸云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之一。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红头船”从这里出发，一批批潮汕人漂洋过海，远渡重洋谋生创业，就如写北方平原离不开黄土地与骆驼，写潮汕平原亦离不开海洋与商船，《拖神》以丰富的笔法刻画了一艘艘精彩纷呈的“船”，比如蟹民的渔船、外来的花艇、陈鹤寿的红头船、海岛的贼船、暹罗的船帮、洋人的“火轮”等，这些船成为樟树埠商贸、集市、铺仓以及日常生活、文化、习俗、梦想交织的底座，陈鹤寿和樟树埠的故事亦借此展开。《拖神》中的红头船，是潮汕人拥抱海洋、融入海洋的文化图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精神寄托。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一位往低处看的人，一条往远方开去的船，构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 《六尺之孤》：魔幻视角下的南方族群精神史

□徐洲赤

长篇小说《六尺之孤》一如其书名所示，是一部关于刺杀的传奇，也是一段革命传奇，但更像是关于族群的传奇，讲述了东南之境繁衍千年的瓯越族人在1949年鼎革之际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和归宿。在似真似幻的族群生活背景下，小说对东南瓯越二十多年的人事变迁与纷争作了深刻而犀利的透视。它以魔幻、悬疑、谍战、考据、传奇、荒诞的笔法来书写瓯人的历史，以瓯人历史来隐喻时代命运，于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展现家族、家庭和民众的精神史。而关于机器人、哼人、山人的族群之争和错乱的血缘关系追溯，也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纵深感和思想气质，使得这部关于刺杀的小说充满深刻的寓意。

严格来说，《六尺之孤》写的是一场革命。20年前，年轻的苏维埃主席和他的妻子一起组织山民暴动，遭到军阀和地方豪强的联手镇压，苏维埃主席被处决，其妻下落不明，遗孤被敌人收养。20年后的1949年，新中国曙光初现，遗孤哼四少爷手刃仇敌，瓯城迎来和平巨变。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故事作为革命叙事，进入当地戏曲，成为屡演不衰的红色经典剧目。

但事实上，在具体情节的推进中，革命场景退居为故事背景，书中大多数篇幅讲述的是跨越大地上的种种族群关系、世风民俗以及缠绕其间的恩怨情仇。

小说一开篇即写道，在瓯越土地上，生活着三个古老族群：机器人、哼人和山人。三个族群间曾经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构成了这里的历史记忆。当初，居于瓯城的机器人强盛之后，便假借哼人领地水渚之城，攻取山谷之城，奴役那里的山人。哼人深感唇亡齿寒，奋起反抗。哼人的反抗遭机器人无情镇压，男壮牺牲殆尽。机器人欢庆胜利之时，山人反击，决百涧之流水淹机器人，幸存之哼人武士趁势而起，击毙机器人首领。机器人心怀恐惧，撤回瓯城，无力再犯。

我把小说开头的这段《上古百山谷口哼人城池遗址考》看作是小说的一个总纲，三个族群之间的历史恩怨，构成了现实的社会群体结构和人物关系。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但机器人、哼人和山人各自的族群气质及社会地位，构成了某种隐喻关系，对应着1949年的动荡现实。这三个族群中，山人有着明确的畲族特征，如三月三、乌米饭、歌队这些民俗，均很明确地指向畲族这个现实存在的族群；而机器人与哼人，从我所查阅的资料情况看，似乎仅出于作者的魔幻想象。

在作者的描述里，有着四“口”的机器人曾经因土地肥沃而物质丰富，但“相当长一个阶段，他们把应该用于劳动的时间浪费在废话空谈上，致使贫穷与匮乏，堕落成为覬覦别人美好家园的侵略者”。他们因强大而变得肆意妄为（大为肆），因富足而变得骄横傲慢（富而骄），因组织规模膨胀而变得不再低调，四处张扬（众而嚣），终于因此而丧失人心，导致社会矛盾总爆发，沦为革命对象。

作者以“器”字命名这个族群，显然有其用心。“器”有义，此字始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的金文，古字形用“页”代表人的头部，周围的四口表示喧哗、吵闹、嘈杂，读作xiāo，引申为张扬、忘乎所以、气焰不可一世之意。此字又读作ào，是传说中的一种鸟，梦想交颈的底座，陈鹤寿和樟树埠的故事亦借此展开。《拖神》中的红头船，是潮汕人拥抱海洋、融入海洋的文化图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精神寄托。

“器”有义，此字始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的金文，古字形用“页”代表人的头部，周围的四口表示喧哗、吵闹、嘈杂，读作xiāo，引申为张扬、忘乎所以、气焰不可一世之意。此字又读作ào，是传说中的一种鸟，梦想交颈的底座，陈鹤寿和樟树埠的故事亦借此展开。《拖神》中的红头船，是潮汕人拥抱海洋、融入海洋的文化图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精神寄托。

“器”有义，此字始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的金文，古字形用“页”代表人的头部，周围的四口表示喧哗、吵闹、嘈杂，读作xiāo，引申为张扬、忘乎所以、气焰不可一世之意。此字又读作ào，是传说中的一种鸟，梦想交颈的底座，陈鹤寿和樟树埠的故事亦借此展开。《拖神》中的红头船，是潮汕人拥抱海洋、融入海洋的文化图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精神寄托。

“器”有义，此字始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的金文，古字形用“页”代表人的头部，周围的四口表示喧哗、吵闹、嘈杂，读作xiāo，引申为张扬、忘乎所以、气焰不可一世之意。此字又读作ào，是传说中的一种鸟，梦想交颈的底座，陈鹤寿和樟树埠的故事亦借此展开。《拖神》中的红头船，是潮汕人拥抱海洋、融入海洋的文化图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精神寄托。

“器”有义，此字始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的金文，古字形用“页”代表人的头部，周围的四口表示喧哗、吵闹、嘈杂，读作xiāo，引申为张扬、忘乎所以、气焰不可一世之意。此字又读作ào，是传说中的一种鸟，梦想交颈的底座，陈鹤寿和樟树埠的故事亦借此展开。《拖神》中的红头船，是潮汕人拥抱海洋、融入海洋的文化图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精神寄托。

“器”有义，此字始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的金文，古字形用“页”代表人的头部，周围的四口表示喧哗、吵闹、嘈杂，读作xiāo，引申为张扬、忘乎所以、气焰不可一世之意。此字又读作ào，是传说中的一种鸟，梦想交颈的底座，陈鹤寿和樟树埠的故事亦借此展开。《拖神》中的红头船，是潮汕人拥抱海洋、融入海洋的文化图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精神寄托。

似。他们作为社会精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犹如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行者。

这是《六尺之孤》里关于社会变革的寓言，这种阶层的分裂和蜕变，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警示，尤其是针对那些“机器人”们，意在告诫他们“勿大而肆、勿富而骄、勿众而嚣”。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尺之孤》所写的是一个革命寓言，一种关于革命发生学的思考，这是《六尺之孤》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它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因此，作者绝非为了仅仅写一场刺杀，他需要借助瓯越这个地方的独特民族关系，借助1949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来表达他关于中华民族这个族群命运的思考。1949年的这场巨变是几千年来几个族群之争的延续，它表明苏维埃革命在这块土地上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它有着本土性的深刻原因，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

何炳棣先生曾说，中国文明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氏族血缘延续得非常长久、牢固，以血缘纽带为轴心所形成的“伦常”关系，以“名”的称号固定为等级秩序，成了社会主要的组织形态和生活秩序。显然，作者想要书写属于南方东海之滨瓯土的“百年孤族”，那种漫长的、纠缠不清的血脉恩怨关系，构成了瓯土族群漫长的精神史。

考察小说里的人物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小说里的蓝大首领是哼四少爷的养父，这一点很有意思。作为统治阶层的蓝大首领，首先杀掉了哼四少爷的父亲，阻断了挑战其地位的哼族的血脉关系，但随后仍然要以一种假冒的血脉关系将其纳入既定的社会秩序中。这一设定深含寓意，它表明哼四少爷对蓝大首领的刺杀，有着复仇和弑父的双重含义，只是哼四少爷所弑的是一个假父，为的是找回真正的父辈血脉。

另一对人物关系发生在贤者机器人和不死巫娘之间，作为山人中的巫者，不死巫娘的故事有大量留白，我们只能从小说里陆续释放的零碎信息判断，她是20年前那场血色风暴的参与者，但领头者没有让她参加那场暴动，因而她逃过一劫。但她的身份显然更为复杂，她与暴动的镇压者贤者机器人之间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胎记。哼四少爷与贤者机器人之间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而她对贤者机器人的恨，甚至超过了哼四少爷，她对贤者机器人的私生女上海丽人有非同寻常的关切，她在身上某一位部位都有着非同寻常的胎记，一个人浴后即会显现的蝴蝶，暗示她们之间可能存在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作为山人文化代表的不死巫娘，与世仇贤者机器人之间居然有着情人与仇人的复杂关系。她要代表山人向机器人复仇，但她与贤者机器人之间显然有段隐秘的情史，甚至我们可以把理解为一段羞辱性的关系，她唯有复仇方能摆脱这段耻辱。她采取的是下毒同归于尽这种决绝的复仇方式：“吃下从种猪口中夺下的乌米饭，巫娘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死死了，如之前承诺的那样到最后一刻，不给人留下痛苦和烦恼，把自己的秘密带到阴间世界去。她自言自语了大半天，说今世没有留恋了，就赶紧到来世去。”

这样一来，几个族群之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父子与仇人、情人与敌人、恩人与世仇，相互纠缠不清。这种独特的族群关系，显然构成了某种复杂的社会形态，发人深省。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Tribe System)，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Shamanism rationalized)，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这段话，为《六尺之孤》中的精神考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然而，这部小说的思考之严肃、主题之庄严，又与其叙事之荒诞、想象之魔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哼四少爷相信，这一定是但丁神父认为可能不存在的修道院……”这世界上居然“可能”有一座“不存在的修道院”，这样的荒诞表述，常常将阅读

是别人的境界/委屈了自己”，最后提出，“自己就是人生的尺度/傲视的是星辰/畅游的是宇宙”，只需要“点点灰尘轻弹拂拭/不忘注视的角度”。

马舜是一位漂泊、孤独、隐逸的诗人，他喜欢黑塞，也像黑塞那样崇尚佛陀和老子。在《色彩》一诗中，他写道：“生命的色彩/是人为地赋予/有多少次地挥笔/就有多少道的绚丽”，表达对生命的激情和态度，紧接着又写道：“走在焦灼的路口/看懂了路边杂草的春夏秋冬/也就看淡了世界的颜色”。诗人对生命的沉思渗透于“路边杂草”的形象之中，最后揭示了生命的真相，“都是一生/殊途同归/大地才是/唯一的目的地”。马舜在诗歌与哲学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又以灵性和直觉超越哲学的羁绊，诗心独运，一字一句都是对生命哲理的展示。他的诗不仅有传统的诗歌之美，更有修身养性、涤心开悟的效用，其表达自然娴熟，干净而不做作，如流水般自然，将个人的思考引向生命和宇宙层面，进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时空和世界，给人以思想上的教益和艺术上的美感。这部诗集既是马舜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一种诗意书写，是在寂静夜里对乡愁的心潮涌动和精神依旧，更是诗人探索人生价值和观照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对于灵魂漂

泊的现代人来说不啻是一剂良药。

《黑塞上空的呼吸》分为《写给母亲》《写给自己》《写给他人》《写给岁月》四个篇章，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但在诗人笔下，普通人庸庸碌碌的生活成为了“抛却世间繁杂、享受返璞归真”的安静之地，洋溢着流动的旋律、流动的美、流动的张力。在这部诗集中，马舜取材广泛、声情并茂、笔法灵活，给人以轻松、洒脱、活泼、诙谐的感觉，随意又轻柔雕琢，却又严肃与轻松于一体，熔哲思与精湛于一炉，如《叶子的颤抖》：“叶子在颤抖/不是因春天的到来/而是挺过了寒冬。”其中大多作品有温度、有感情、有哲理，甚至还有故事、有情节、有细节，有议论和批评，如《遇见海子》《写给(天使，望故乡)的尤金·甘德》《生活的底色——写给(何以家)》等。当然，马舜的这部诗集并非完美无缺，情感表达上显得比较悲凉；表达方式可以多一点留白。

罗曼·罗兰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马舜善于从眼下和琐细处发现和提炼生活中有质感的美，从繁芜的世相中得到新的灵感，激发新的想象，对自我和社会进行省思，并能真切品味并感悟其中的妙处。他的才华是独特的，而且通过每天喷发的诗句，正在锻造出一个崭新的“自我”。

与这样的文字表述方式相关联，《六尺之孤》的诸多情节呈现为一种不确定性叙事。比如主人公哼四少爷的政治身份始终暧昧不明，其复仇到底是私仇还是革命，似乎是一个谜；不死巫娘对贤者机器人不依不饶的追杀到底是出于情杀还是革命行为，似乎也是个谜。小说里几乎所有的人物形象都不太好把握，犹如印象派绘画，犹如雾里看花，如蓝大首领对镇压行动的真实态度、贤者机器人对和平起义的真实想法、上海丽人与不死巫娘之间的真实关系、桔子姑娘的真实身份等，似乎都那么明晰，让人难以判定。

于是，种种不确定性使得人物行为常常也是趋于不确定的荒诞性后果，一些偶然性事件不断干扰着事件的进程，比如反复出现的误杀：蓝大首领的死、但丁二世的死、一头猪为贤者机器人替死、哼四少爷躺在肉案上险些被误认为汉奸丧内肉奔，体验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连地下党员秋思虹的牺牲也是个意外——饶舌师尊翁德扒灰的牺牲品。

尤其关于那头猪的死，构成了书中最为荒诞而魔幻的段落：不死巫娘的那碗乌米饭本来用来毒杀贤者机器人，但被猪误食，之后，“那头种猪突然欢声嚎叫，冲出了圈栏，从敞开的窗口跳出屋外，一直冲到廊桥那边，仿佛他知道那里有医院求救似地尖叫了数声之后，跳上石阶，但没有力量再攀爬上去。四蹄一软滚圆的身体滑了下去，重重地掉进了深潭，深潭寂寞，种猪顺着激流挣扎着，很快被冲走了，冲到了谷口的水渚之地。”庄严的复仇代之以闹剧收场。

现代性叙事反对过度明确的中心意义，强调瞬间的微妙感受和意义的模糊性，往往在去中心化表现事实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如情节游离、叙事拼杂、故事残缺等等，以保持生活本真的自然诗性和情节的饱满多汁、异彩纷呈，以文本的开放性，去挑战读者的审美习惯，引发放散性的自由联想。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小说的智慧就是追求不确定性的智慧。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者的祛魅利器，其精神品格是对传统话语和既定意义的消解，在变动不居的否定和怀疑中，起到祛魅的效果。《六尺之孤》将一场复仇与和平解放写成了一场迷局与悬案，但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突然恢复为一种传统的、确定性的语言形态，编年史式地罗列了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戏曲化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前后鲜明的反差而呈现出荒诞色彩，因而更进一步凸显祛魅的效果。